

做有良知的学问：陈建华教授访谈录

Going into Scholarship with Conscie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Jianhua

耿海英（Geng Haiying） 陈建华（Chen Jianhua）

内容提要：陈建华教授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成果显著，1970年代末他迈进俄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新的世界一经打开，便不断结出累累果实，特别是他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揭开了新篇章。在此基础上，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以创新的理念，积极从事外国文学史教材的建设；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列夫·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思考，为推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陈建华；学术人生；访谈

作者简介：耿海英，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项目批号：17AWW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2&ZD279】的阶段性成果；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辞海》外国文学分科主编等。有独著9种和两人合著2种，如《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阅读俄罗斯》《丽娃寻踪》《当代苏俄文学史纲》等；主编著作10多种，如《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卷）《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4卷）《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顿河晨曦——今日俄罗斯漫步》等；主编教材8种，如《外国文学史新编》《外国文学作品选新编》《插图本外国文学史》等；其他编著和译著多种，如《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15卷）《凝眸伏尔加——俄苏书话》《托尔斯泰思想小品》《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米尔戈罗德》（果戈理小说集）等。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成果曾三次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一次；另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诸多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中俄文学关系、外国文学学术史。

Title: Going into Scholarship with Conscie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Jianhua

Abstract: Professor Chen Jianhu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late 1970s, he stepped into the door of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e continuously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s long as the new world was opened up. Especially, the outcome of his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has uncovered the new chapter for the study of related areas. Based on it, he has continued to open up new field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the innovative ideas. O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he adheres to think o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the academic course of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 study of academic history of Leo Tolstoy, and make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Chen Jianhua; academic career; interview

Authors: **Geng Haiying**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954109529@qq.com). **Chen Jianhua**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nd a Ph.D. advisor. He also serves as a member of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SSFC), the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Key Research Base of Social Science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the chief expert of the major program of NSSFC, the chief editor of Foreign Literature subsection of *Ci Hai*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and so forth. He has nine monographs and two coauthored books, such a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Reading Russia*, *The Pursuit of Liwa*, *The Outline of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Soviet-Russian Literature*, etc. He is a chief editor of a dozen of books, such as *Academic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12 vols), *Research on History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in China* (4 vols), *Russian Humanistic Thought and China*, *Dawn on the Don River: Walking in Russia Today*, etc. And he is a chief editor of eight textbooks, such as *A New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New Selected Work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etc. Moreover, he is the author of various other edited books and translations, such as *Series of Appreciation Dictiona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15 vols), *Gazing the Volga: Talking about Russian-Soviet Books*, *Tolstoy's Essays of Thoughts*, *Th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Tolstoy in China*, *Mirgorod* (Collected

Stories of Gogol), etc.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a hundred papers in the important journals. He has been award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three times, including the first prize; he has also received many awards, such as the First Prize for Excellent Achievements in Social Science in Shanghai, the First Prize for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Award, etc.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ussian literatur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jhchen@zhwx.ecnu.edu.cn).

耿海英（下文统称为耿）：陈老师，我在博士阶段很幸运地遇到了您。一晃20年过去了，这20年我向俄国文学的深度与广度拓展，这与您的引导分不开。这些年里，与您谈学术比较多，但对您早年的生活，以及怎样与俄国文学结缘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很想借此机会，听听您的介绍。

陈建华（下文统称为陈）：我出生在宁波，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上海。其后的经历比较简单，如果从1954年入小学算起，到1978年进入大学前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12年。前12年，我在上海完成中小学学业，家和学校在巨鹿路、淮海路、瑞金路一带，周边的文化环境不错。小学期间的班主任童伯修老师关爱学生，她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书，当然大多是一些被称之为“闲书”的读物。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童老师将一张市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放在我的手上，更助长了我读“闲书”的热情。那时图书馆里俄苏读物很多，它们和其他书籍一起，滋润了我的心田。也许是读书多的缘故，我的课业成绩一直很好。1960年考入向明中学，入校后被分配在俄语班，此后初高中六年我在市重点中学度过，由于学的是俄语，因此也多了一点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1966年初夏，高中即将毕业，高考前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但是深造的愿望很快成了泡影。随之而来的后12年不太平静。1968年我被分配到赣东北的一个半军事化的“三线”厂工作，厂区位于深山老林，很难找到想读的书。相比那些去农村的同学，我们这些去工厂的“老三届”学生，生活条件会好一些，但阅读的自由度显然不如他们。青春时光就在渴望读书而又不让自由读书的环境中度过了。因工作需要，有段时间我常驻南昌，成了省图书馆的常客，管理员与我熟悉后，允许我进书库借书，使我有机会多读了一些文史书籍。“文革”中后期，工厂情况不佳，人心不稳，我对前景感到迷惘。1978年，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混乱年代结束了，但12年岁月却无法弥补。

耿：听您讲述那段历史，很有感触。不过，看得出，您在混乱年代还是有自己的追求，心中保留着对文学的热爱。而且，不管前12年或者后12

年，我似乎都能感受到您与俄国文学的一种隐秘的缘分。陈老师，能说说您在大学里如何走近俄罗斯文学的吗？

陈：入校后，我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结构和年龄方面的缺陷，所以在泛读书籍和泛听课程的同时，努力思考自己的主攻方向。1978年秋天，戈宝权先生来校做了两场讲座：“鲁迅与外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与中国”，展示了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魅力。戈老的讲座唤起了我内心的某种渴望，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俄国文学作品，同时也开始注意系里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当时，倪蕊琴老师在托尔斯泰研究等领域已经颇有成就，余振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与曹靖华一起主持过俄语系工作，王智量和干永昌老师在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也均有造诣。同时，外语系也有冯增义、朱逸生、徐振亚等实力颇强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队伍。

耿：这样的师资力量，确实得天独厚。阅读您早期写下的文字，总觉得您在大学期间已经能非常专业地进行研究了。这是现在的大学生一般做不到的。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陈：这里有一个契机。大一下，我得知系里即将招收首批俄国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以自己的兴趣与基础为由，写了一份要求同时兼修研究生课程的申请交给了系里。系里无此先例，却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成了我进入大学后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系里主事的是徐中玉先生。系里为学生创造的宽松的求学环境，成就了无数学生的成才梦。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促使我走近俄国文学的因素不少，但最重要的外界因素莫过于良师的引导和自由宽松的环境。由于获得了修读研究生课程的机会，入学第二年我就认识了倪老师等专业老师，在他们的引导下，我逐渐深入俄国文学研究的堂奥。当年的研究生课程扎实、深入，本校与外校的老师分别讲专题，还请了草婴、夏仲翼、吴元迈、方平等学者来讲学。草婴先生是我校的兼职教授，1980年秋，为我们开设过文学翻译系列课程，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俄国文学翻译中的心得体会。后来我与草婴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得到他的不少帮助，他为我编的《托尔斯泰在中国》一书写序，参加我主持的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的学术会议等。我认识复旦的夏仲翼老师、社科院的吴元迈老师和南大的余绍裔老师都比较早，余老师是我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夏老师和吴老师都为我的书写过序，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至于专业上的进步，最多得益于倪蕊琴老师。至今我仍记得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治学一要有信心，二要谦虚。1979年秋天，我刚写出一篇有点像样的论文，她就予以鼓励，推荐我在1980年的“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使我开始与学界有了接触。作为她的入门弟子，倪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循循善诱的学术引路人，更是善解人意的长者。如果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么与倪老师的相识则使我的人生目标得以明晰。在托氏会议和不久后的“全国陀思妥耶

夫斯基学术讨论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年轻学人朋友。在走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我有缘与比较文学相逢。我校在国内首批开出“比较文学”课程，我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并与谢天振等朋友一起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刊和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做过具体的工作。1983年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会议，我递交的论文收入了论文集，并结识了一批后来在比较文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友人。

耿：有这么多学术界的良师益友，真是幸事。我想起我做《现代人》研究时，其中涉及第二任编辑普列特尼约夫，他成长的环境很好，周围有茹科夫斯基等一批杰出人物。中国80年代的学术氛围和云集的优秀学者，也滋养了一大批华师学子。

陈：我当年接触的不少学养深厚的老师和学者，大多治学严谨、谦虚低调。这些老师身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学术追求联系在一起。不管在学生时代，还是在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始终感受到前辈师长的关爱和引导。

耿：是的。我们从您身上也能感受到这种品质的传承。陈老师，您能谈谈您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吗？

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我的身份首先是一名教师。我的教学工作量一直很满。上好课，带好学生，是我的本职工作。刚开始，除了本科的《外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等主课外，我带过文科基地班、指导过硕士和博士，长时间负责教研室工作，还一度在系里管事。我的科研工作与教学分不开。80年代，我和倪老师合著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合作主编的文集《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都曾为选修课所用。90年代，我的目光开始更多地转向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出版了专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该书后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从90年代开始，我编写了多种专业课教材。进入新世纪，我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向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领域。它是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延伸，也与我相继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and 重大项目有关，这些项目的成果分别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等著作。

耿：陈老师，我从您讲述的内容中清晰地看到了您学术发展的轨迹。我想就若干细节问您几个问题。您写过托氏传和陀氏传，而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兴趣，所以也想请您谈谈对陀氏的研究。

陈：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开始得比较早，大概在70年代末。我读了他的许多作品，也写过一些文章谈到他。比如论文“《两重人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探索”、“论《死屋手记》”、“长篇结构模式的突

破——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长篇的‘对位’、‘对映’结构”，散文《那盏点亮的门灯》《心，为人民的苦难而颤动》以及文学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专章和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等。十多年前，陈燊先生把他主编的22卷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寄给我，我为此写过文章“一项泽被后人的学术工程”。我在多次赴俄访学时，寻访过陀氏留下的很多遗迹，如莫斯科的玛丽英济贫医院的出生地、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弗拉基米尔大街和伯爵胡同拐角处楼内的寓所（处女作《穷人》写于此）、流放前被关押的彼得保罗要塞、彼得堡晚年的居所（《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于此）、齐赫文斯基墓区的陀氏墓地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回忆。在参观陀氏莫斯科故居时，收到过波诺马廖娃的赠书。我还主持过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研讨会”，不少陀氏专家与会，如冯增义老师。冯老师是倪老师的爱人，有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和译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重要成果问世。我听过冯老师的陀氏研究课，我的专业俄语课也是冯老师上的，我对陀氏的兴趣受到冯老师的影响，我是沿着师长的足迹在走近托氏和陀氏。1986年召开“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我递交的论文就是刚才提到的“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

耿：我在您的这篇论文中发现，您已经在自觉运用“对位法”视角分析托氏与陀氏的艺术创新。在另一篇“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您强调了陀氏的“对位法”和“复调”艺术。在当时巴赫金的理论还没有被大家全面认识之际，您已经是很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陈：关于巴赫金，夏仲翼老师等学者在80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些介绍，当然影响还不像现在这样大。我不是巴赫金和陀氏研究专家，我的这些文章只是触及，谈得不深。

耿：学界多知道您的托学研究，其实您对中外陀学的动向也很关注。您能谈谈20世纪俄国和中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情况吗？

陈：简单说说吧。就西方而言，20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声誉日高，影响甚至超过托尔斯泰，西方评论界较多关注的是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当代西方的陀氏研究成果不少。在俄苏，20年代前有些不错的陀氏研究成果，如巴赫金对陀氏“复调”小说形式的探讨等。此后陀氏受到排斥，直到解冻时期才重新获得肯定，大量研究成果随之出现。陀氏作品在中国姗姗来迟，早期评论主要看重他的人道主义和心理分析，解放前陀氏大部分长篇小说被译介过来。1950-1970年代，陀氏在中国境遇不佳，改革开放后受到关注。人文和上海译文都推出过陀氏文集，重头的是22卷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陈燊先生的序有六万字，学术含量很高。如今，国内陀氏研究成果爆发式增长，已出版数十种专著和译著，如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等。

耿：看来，您对中外陀氏学术史捻熟于心。您以陀氏和托氏为核心，对俄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作了深入研究。这些为您的学术拓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当年在报考您的博士的时候，您那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是我烂熟于心的一部著作，它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该著堪称中俄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部开拓之作。钱谷融先生、夏仲翼先生都为此书作了序，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发现您一旦开启了这个视角，便有一发不可收的趋势，您开始关注整个中外文学关系问题，关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问题，而且频频有重要成果面世。我在天津师范大学工作时将4卷《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赠送给学校图书馆，他们感谢并赞叹：真是不可多得的一套高质量的学术书籍。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在学界也广受好评。您在华东师大不间断地从教多年，培养学生无数，我们硕博群就有70人，现在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已经是骨干了，想必您也很高兴。

陈：是的。看到学生们的成就，当然很高兴。如果算上本科生，我教过的学生非常多，现在联系比较多的是当年的硕博生和博后。几十年过去了，我从青年教师变成年过70的老教师，但与学生们在一起，常常忘了这一点。和学生相处，我一直觉得很愉快。只要学生努力，我就尽可能给予他们帮助，让他们顺利度过人生的这个重要阶段。而且教学相长，教学中我也提高了自己，不少学生还参与我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让我想到学生培养的问题。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既有中文专业的也有外语专业的，双方听课也比较自由。当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教学上的这种交流就不那么方便了。我觉得，应该让教学层面的多学科合作与交流活跃起来，这样对学生的成长有好处。

耿：您提到的多学科合作与交流问题很重要。

陈：研究层面也是如此。不同学科之间定位的交叉，只要规划得好，合作与融通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些年来，国家陆续推出一些重大招标项目，学科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

耿：陈老师，我们再来谈谈您的教材编写，我看到您的教学成果中有一个《外国文学经典》光盘，1998年出版的。这是怎么回事？

陈：我编的教材中除通常的文字类教材外，也编过插图类教材和多媒体课程教材。《外国文学经典》与1995年我校成为国家首批文科基地有关。当时，我们想借此对“外国文学史”课程进行一些改革，利用多媒体技术，扩充这门课程的知识容量和丰富教学的形式。先尝试做的是“俄罗斯文学”课程软件，完成了文稿编写、图片和影像的采集，还邀请计算机系师生制作软件，投入了不少心血，制作基本成功。接着，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又完成了

《外国文学经典》的制作，并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反响还不错。

耿：这在90年代是比较超前的教学实践。我看过这个《外国文学经典》，教材集文学史、作品分析、照片、作品插图、影视片段、作品朗诵、作家手迹和相关音乐等于一体，当时的学生能有这样的外国文学教材，真是幸运而享受。我看到，这个教材获得了不少奖。

陈：这个教材1997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校优秀CAI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01年，作为教育部课程项目，我们又丰富内容，以两张光盘的形式，完成了外国文学网络课程教材的制作，由高教社和高教电子音像社联合出版。它的副产品是纸质本《插图本外国文学史》，高教社用了铜版纸印刷，大开本，配有与文学史和作品相关的彩图。与此相关，2003年我的《外国文学史》成了我校最早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后又成了“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从90年代开始，我陆续获得上海各类教材建设项目5项，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多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不仅90年代的辅助教学软件已经过时，其他教材也需要完善。这些年除了主编教材外，还参与多种教材的编写，如郑克鲁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聂珍钊教授等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外国文学史》等。

耿：您参编的那两种教材和您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新编》等教材，使用范围很广，而且与老教材相比也有不少变化。您能不能谈谈您编写教材的理念呢？

陈：我认为，新教材的编写并不是要否定前人的成果，也不是简单的章节增删，而是要求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改变某些思维定势，加强对文学史观和建构模式的整体反思。我在编写《外国文学史》时做了些尝试：1、扩大涵盖面，纳入更多文学体裁样式；更广泛地注意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家。2、以文学为本位，避免社会背景的介绍占据过多篇幅，注意艺术分析。3、突出中国学者的立场，不照搬国外学者的材料和观点；组织高水平编写队伍。

耿：我从另一套书中也看到了相似的编写理念，那就是您任总主编的《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我发现，那套书的体例也很有特点，除了诗歌小说戏剧外，还有散文卷、传记卷和神话史诗民间故事卷。

陈：2004年前后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找我，谈出版外国文学鉴赏辞典的事，由我主持并一次性推出“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在有限的时间里，从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挑选有价值的作品，并协调好庞

大的编写队伍，难度不小。外国文学无法像中国文学那样分类，经过反复酝酿，确定分15卷：神话史诗故事1卷、诗歌3卷、小说5卷、戏剧3卷、散文2卷、传记文学1卷。同时强调鉴赏文字兼顾知识性、学术性与趣味性。我约请杨正润、吴笛、杨恒达、孟昭毅、王立新等朋友担任各分卷的主编，他们都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这套丛书能有较高的质量与各卷主编和所有参与者的辛勤付出分不开。辞书出版社曾将这套书列为2009年除新版《辞海》以外的最重要的出版工程。

耿：说到《辞海》，我知道您和《辞海》也有关系，您是《辞海》外国文学分科的主编，也是《大辞海·外国文学卷》的主编。

陈：准确地说，应该是主编之一，我这是接草婴先生和夏仲翼老师等前辈师长的班，为《辞海》编撰出点力。《辞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给编撰者带来压力。我的工作主要是组织专家完成辞条，最后复审。我请了袁筱一（法国文学），卫茂平（德国文学），孙建（北欧文学）等学者参与，他们专业能力强，交给他们放心。《辞海》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前些年，我还撰文分析了外国文学辞条编撰中存在的学科设置、收词、释义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最近，《辞海》数字版要上马了，这是顺应时代变化的举措，出版社相邀，我答应了，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为《辞海》再尽绵薄之力吧。

耿：您在很多出版社出过书，但是我发现您与重庆出版社交往不少，您能谈谈与他们的合作经历吗？

陈：新世纪初，我校哲学系一位教授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主人是重庆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我以为是随便聊聊，谁知重庆出版社的领导很认真，后来常常上门来约稿。我开始在该社出书。2007年就出版了5种8本书，其中有托氏画传和陀氏画传2种；有我主编的著作《走过风雨——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和散文集《顿河晨曦——今日俄罗斯漫步》2种；有4卷本《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后来，我承担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也在重庆出版。2009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卷同样交给了重庆出版社出版。后三种书分别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以及其他多种奖励。作者和出版社都很高兴。应该说，与重庆出版社的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态度诚恳，编辑认真。

耿：陈老师，您除了本职工作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兼职，如您兼任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您能谈谈这些兼职与您的学术活动的关系吗？

陈：这些年，我的学术兼职逐步减少，如今兼着的大多是虚职，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20多年前，教育部在高校设立百所社科基地时，批了两个“俄中心”，黑大的，以语言文学为主；我们学校的，以国际关系为主。我校“俄中心”在筹建时和中心获批后的一段时间我出过力，后逐渐淡出。不过，和黑大“俄中心”的关系却始终密切，黑大是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我通过中心与相关领域的学者有了更多的交流。比较实的兼职也有，如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我是2004年进入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组的，开始时主要是年度评审，接下来有了后期资助、学术外译、重大项目、文库等新的评审内容，初期都是会审，而且学科组工作认真，那就比较忙了。现在不少改为线上了，情况好一些。不过，随着申报量和结项量的大幅提升，每年看的材料很多，占用了不少时间。当然，这些阅读，特别是接触到的一些质量很高的成果，也开阔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知识积累。我看的材料不仅仅这些，还包括本市的和省际交流的社科项目评审、社科奖评审、学科点评审等等。好材料很多，低水平重复的东西也不少，有时还会看到有问题的材料。学界提倡“原创精神”是有道理的，原创的本质就是创新，人文社科领域的原创更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出的一步。要有原创成果必须沉下心来做研究，急功近利是不行的。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师生和学者是严肃对待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的。做有良知的学问，应该是我们的追求。

耿：陈老师，您说得非常有道理。做人和做学问，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我知道，您这些年仍一直在忙碌。您能说说您今年的工作吗？

陈：今年事情比较多些，主要是为两个项目结项，都与托尔斯泰有关。一个是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的个子项目，成果为《列夫·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和《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文集》，书稿上半年已经交给译林出版社。另一个是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已经进入结项阶段，也是两本书稿，分“史论卷”和“学科卷”，谈的是中国的“托尔斯泰学”。

耿：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又回到了您的根基——托尔斯泰研究。您的学术路径是从托尔斯泰研究出发，扩展到俄国重要作家作品，再扩展到中俄文学关系，然后进入学术史领域，最后又回到托尔斯泰。您的学术研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度，加之您作为20年的社科基金老评委，目之所及，涉及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包罗万象的问题。

陈：我个人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是有局限的，但就整个外国文学界的研究来说，它的涵盖面是可以用“包罗万象”这个词来概括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有过酝酿、起步、拓展、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成果数量

上有突破，质量上也有质的变化，进入21世纪，变化更加明显。就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吧，出现了拜占庭文学的文献翻译与文学史书写、加勒比海文学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等，这些领域以前较少有人关注，更不要说这种规模的深入研究。尽管还有各种问题，但总成绩是放在那里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都在进步。

耿：是的，这些年外国文学研究进步很明显，这和研究的方法论有关吗？

陈：应该有关。我曾在一本书中用两卷专门关注了方法论问题，约请陆建德、杨慧林、聂珍钊、谢天振、刘建军、王宁、叶舒宪、王立新等十多位专家，就他们所擅长的领域阐述各自的见解，有特色，有深度。现在注重中外交流，国外材料比以前容易获得，但不能人云亦云，在强化对话交流和引入有价值的学术资源时，要努力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学术逻辑和范式体系，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如今的中青年学者是发展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历史的创造者，学术繁荣景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有关。不久前，我在一本书的“三版后记”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踏入学界后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在也到了逐步退出舞台的时候。如今在这个舞台上唱主角的是中青年学者，他们赶上了可以趁年轻大展才华的时代，不少人有着超越我们的视野与学识，相信他们会在这个舞台上更有更为出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以及与我有过相似经历的不少学者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青春时期十余年的生活波折使我们错过了高校学习的最佳阶段，这会带来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有些问题不是靠奋斗能解决的，我的著述中存在的不足多与此有关。当然，我们这一代人努力了，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在的中青年学者是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发展无可限量，这是中国外国文学界的希望和未来。祝福他们！

耿：陈老师，听说您刚从北京回来，这次是去开什么会？

陈：我这次去北京参加的是中小学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委会的会议。前两年，偶然受托审阅了一套高中语文教材，并在视频会议上发了言，指出了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选择、选文取段、注释规范等问题。我以为只是客串一下。没想到，后来教育部教材局相关领导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我对中小学教材很陌生，但推辞未果。前一阵，我抽时间认真阅读了人教社寄来的18本中小学教材，确实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次去北京就是讨论教材修订中的具体问题的。进入中小学教材的领域，发现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修订很不容易。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比例不大，我就相关问题提了些建议，希望能为孩子们的教材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耿：这个作用可不小，因为义务教育教材涉及面太广了。您退而不休，贡献不断。希望您保重身体，继续给我们惊喜和鼓励。陈老师，您能用几句话为我们的这次谈话做个小结吗？

陈：我就用几年前你们给我编的70寿庆纪念册上的一段话作结吧：做有良知的学问，这是师长传承给我的学术血脉，而与众多学子的相识和相处，则赋予我生命的活力。回想往事，有过青年时代长达12年的蹉跎岁月，也有过丽娃河畔40余年的充实人生，为师为学，有遗憾也有收获。愿学前辈师长，活出夕阳人生的豁达与精彩。

耿：很感动！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谈。

与陈老师的对话到此告一段落。作为陈老师的学生，我觉得无比幸运，我们几乎所有他的学生都有同感。导师谦虚为人，低调行事，温和儒雅，不遗余力地帮助和提携年轻一代学人，我们受益良多，就像我们经常去老师家的园子采摘各季的果子一样，多得老师的恩泽。陈老师的学术果园结满果实，他经常给我们讲，要做有良知的学问，他不仅自己践行了这一信条，也将它传递了给我们，我们在陈老师的学术果园里收获满满。